

“中国大熊猫之父”胡锦矗的半世熊猫缘

本报记者叶含勇、余里

“今天大家共聚一堂,为保护大熊猫事业做出努力,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贡献。希望年轻人走出家门,多在野外跑一跑,看一看,到野外多做一些观察,研究一下大熊猫的栖息地如何,大熊猫现在的发展状况如何,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这是一段只有37秒的视频,记录了胡锦矗生前对年轻人最后的寄语。

2月16日晚,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的胡锦矗在四川南充病逝,享年94岁。

19日下午,四川南充市殡仪馆,气氛庄严肃穆,前来送别胡锦矗的队伍中,除了西华师范大学的师生,他的生前好友,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弟子们。

作为中国第一代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者,胡锦矗见证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的每一个重要瞬间,他被誉为“熊猫教父”“守护国宝的国宝”,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我国研究大熊猫的标志性人物。

半世熊猫缘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7年,28岁的四川开江小伙胡锦矗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脊椎动物研究班毕业。正值壮年的他,一腔热血,回到四川。

彼时四川南充师专新设了生物系,急需教师。背着还没来得及拆开的行囊,胡锦矗直接到了南充。作为生物学者,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多接触野外,在实践中进行研究。

1971年,乒乓球打开了体育外交的大门。

1972年,大熊猫打开了另一扇外交大门。

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访华,专程去北京动物园参观了大熊猫。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中方决定将两只大熊猫“玲玲”和“兴兴”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这一年,后来被美国人称为“大熊猫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飞鸟和鱼打了十多年交道后,已是四川省知名野生动物专家的胡锦矗,迎来了研究生涯的转折点。1973年,周总理召集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干部开座谈会,要求开展以大熊猫为主的珍稀动物调查。1974年,45岁的胡锦矗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了一支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又称“野调队”),组织和领导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

作为此次调查的队长,胡锦矗考察了四川

2月16日晚,胡锦矗在四川南充病逝,享年94岁。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的每一个重要瞬间。在他的引领下,一代一代大熊猫科研人员走上前台,一项一项大熊猫科研成果出炉问世。



▲胡锦矗教授与大熊猫(资料照片)。西华师范大学供图

所有的大熊猫栖息地,他发现很难在野外看到大熊猫,即便遇到也是匆匆一瞥,相机还没掏出来,大熊猫就转身匿入山林,因此很难掌握野外大熊猫的分布情况。

胡锦矗想到,大熊猫每天要吃竹子,要排便。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残留竹节的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和活动范围等——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熊猫的“胡氏方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四年多的时间里,川、陕、甘的2459只大熊猫,特别是四川省的1915只大熊猫,就这样被胡锦矗和队员们用“胡氏方法”“找”到了,并最终形成一份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

基于这份宝贵的调查报告,卧龙自然保护区从原来的两万公顷扩建为二十万公顷;位于四川省北端的青川县唐家河从一个伐木林场变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兴蜂桶寨、北川小寨子沟、马边大风顶等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获批。

“五一棚”

胡锦矗的女儿胡晓回忆,父亲病重时言语不清,“五一棚”三个字却说得很清晰。

“五一棚”位于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地带,如今已成为全球大熊猫研究者的

“朝圣之地”。但在1978年刚建立时,这里只有几个简陋的窝棚。

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资源调查后,国家决定继续加强大熊猫的生态学研究。1978年,胡锦矗牵头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取名“五一棚”,因为从住地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

在“五一棚”,最苦最累的活,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跟踪定位戴着无线电颈圈的几只大熊猫。夜晚,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雪地,踩着没膝深的积雪,反复测试,确定大熊猫的位置。一夜下来,胡锦矗的军大衣冻成冰甲,走起来如机器人一样咔嚓作响。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胡锦矗带领团队用长达八年时间,在35平方公里区域内,建立了7条观测线路,并获得了大量有关大熊猫生物学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是迄今为止野外观察追踪大熊猫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科考,他们首次系统地对大熊猫生态学、行为学、繁殖学等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研究成果。

1985年,胡锦矗编写的首部关于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的学术专著——《卧龙的大熊猫》出版,首次揭秘了大熊猫在密林里的“隐士”生活,引起世界动物保护学界的极大关注。这部著作至今仍是具有权威的大熊猫保护科研基础性资料。

以“五一棚”为起点,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拉开序幕。胡锦矗带领的团队虽扎根在四川卧龙的山野之间,却很快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开始走上正轨、走向国际。

1980年,以大熊猫为会标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后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即WWF)进入卧龙,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增设帐篷,扩点建站,派驻专家。这不仅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起点,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保护工作。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得益于中国持续数十年的保护,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因为胡锦矗,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才能取得这样丰富的成果。”被誉为“20世纪三位杰出野生动物研究专家”之一的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这样评价胡锦矗在大熊猫保护上的成就。

一生的骄傲与遗憾

一直到92岁生日之前,胡锦矗都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工作。在位于四川南充的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3楼317号“胡锦矗教授工作室”,无数人曾坐在这里的小沙发上,与这位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的泰斗交谈。人们把胡锦矗视为一个大熊猫数据库,

和大熊猫有关的一切问题,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西华师范大学的野生大熊猫研究在全国高校中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科研成果举世瞩目,也因此享有“熊猫大学”之称。胡锦矗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一生的骄傲,就是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我们国家动物研究所搞大型动物和熊猫研究的,全是我的学生。”

谈及人生中的遗憾,他则说:“人生有限,培养的学生还不够多。”

胡锦矗认为,学好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读好大自然这一部无字之书。1984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中国保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就是胡锦矗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魏辅文回忆胡锦矗第一次带领学生去野外科考。“且不说没有遇上大熊猫,蚊虫、蚂蟥、草蝉的叮咬常让人心烦气躁。羚牛、菜花烙铁头蛇的攻击也得时时提防。”魏辅文说,可再看看胡老师,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日复一日带着学生采集标本,辨认动物痕迹,回到宿营地,再累也要坚持整理笔记。

胡锦矗用实际行动告诉学生:这是一条寂寞而漫长的道路,点滴成果都需要艰苦的付出。他总是叮嘱学生:“无论你走过多少艰险之路,你采集的数据、资料一定要准确,要经得起检验。”

教书育人、做好研究,成了胡锦矗余生最大的事业,他说:“我们有世界上唯一的种群和栖息地,科研搞不好,对谁都没法交代。”

科研遇到关键节点,已经七八十岁的胡锦矗,仍然选择上高山、进森林、住窝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最真实、最一线的数据资料。在胡锦矗的引领下,一代一代大熊猫科研人员走上前台,一项一项大熊猫科研成果出炉问世。直至退休,胡锦矗培养出近二十届研究生。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成为大熊猫研究界的扛鼎者。

“先生之为人为世,无疑是终生之楷模。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以身为他的弟子而自豪和骄傲。”在告别仪式上,魏辅文哽咽着说,先生爱学生如子,总能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传道授业,总是鼓励学生“最美的风景在山巅”。

正如胡锦矗生前经常叮嘱,“研究大熊猫是国家重任,也可以说是时代和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参与采写:龙婷婷)

这位老县长,一家四代人,迎战风沙70年

本报记者高爽

走进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的一片林地,举目四望,树木葱茏。弯腰从树影掩映的小径上抓起一抔黄土,细沙很快从指缝滑落,似乎在讲述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芜。

彰武县,紧邻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96%,是辽宁的风口和“沙窝子”。几十年前,这里一年365天中有240天在刮风,漫天黄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临着沙进人退的困境。

治沙累、治沙难,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誓要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筑起一片绿色生态港湾。

这是一家四代人,在悠悠70岁月里治沙的故事。

不做县长来治沙

1953年深秋,寒冷笼罩着彰武县北部白茫茫光秃秃的沙丘,刺骨的北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在章古台火车站东一户农家土坯平房里,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正向房东老汉了解当地的风沙。老汉指着被风沙敲打得簌簌抖动的窗棂说:“刘主任你看,咱这地方啊,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遍地沙尘滚,草木不得生。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呀。”

老汉说的“刘主任”,是刚从当年的辽西省县长岗位上调任到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现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担任首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刘斌。在刘斌墓前,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讲师刘莹为记者讲述了刘斌初来彰武的故事。

那时,章古台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为了像一棵树一样让自己的根牢牢握住这片土地,刘斌说服妻子、带着孩子举家搬迁到章古台。

来到章古台镇第二天,狂傲的风沙就给刘斌“上了一课”——清晨,刘斌的房门被流沙堵死。他的同事从窗户爬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堆铲走。刘斌推门走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黄

沙正向我们挑战呢!”

后面的日子里,刘斌带领着技术人员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来到沙丘上开展试验,可地里刚播完的种子,不到半天就被风吹走;即便长出小苗,也很快被沙掩埋。

试验、失败、总结经验、再试验……刘斌等人在科尔沁茫茫沙海中不断寻找,终于发现了能够在沙地生存、有着强大的防风固沙能力的灌木植物。1957年,他们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顺风推进,前挡后拉,分批治理”一整套综合固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流沙固定住了,但要挡住狂风,还是要造林。

1954年,刘斌和技术人员种下2000棵油松,但只活了两棵。痛定思痛,他们广泛搜集资料,最终发现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樟子松适宜在沙地和山地上生长,且耐旱耐寒耐瘠薄。

在刘斌的支持下,1955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等人在呼伦贝尔沙地中找到原始沙地樟子松林。他们将5000棵樟子松树苗引种到章古台,树苗成活后,形成国内最早的樟子松人工固沙林——这一举措开创了樟子松引种治沙的先例,1978年,樟子松沙荒造林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刘斌参加了大会并受奖。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已获得上百项科研成果,没有一项写上过刘斌的名字。

1989年,时年84岁的刘斌在子女的陪伴下回到章古台镇。他走进万亩松林,抚摸着一棵棵松树,对身边的亲人说:“等我死了,要把我送回来。”

1990年3月31日,刘斌因病逝世,家人依他心愿将他葬在了章古台镇。

“墓地后面的树,就有当年刘斌带人种下的。”顺着刘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棵棵樟子松,高大挺拔,翠绿葱茏。

刘斌何尝不像一名将领,树是他的战士,他们一同与风沙搏斗。如今,风沙已被击退,树木无悔地守护着他。



▲刘斌(右三)和工程师韩树堂(右一)探索固沙方法。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供图

献了终身献子孙

因为在沙地上造林护林太难了,容不得一丝懈怠。”

正如曾为军人的刘斌生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战场上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难道还战胜不了这肆虐的风沙?狂沙一日不退,就一天不离治沙阵地!”

如今,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949年前的18万亩增长至212.96万亩——这是治沙人书写在沙地上的传奇。

现在,刘树春、刘树新兄弟俩依旧生活在章古台镇,他们生活艰苦,内心却骄傲而满足。“2011年,我父亲刘秀森去世,我和哥哥按照父亲的嘱托继续护林到今天。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退休了,但我家第四代治沙人已经返回了章古台。”刘树新说。

造林守林扬精神

没错,那位在刘斌墓前做讲解的姑娘刘莹,是刘斌的重孙女,也是刘家坚守在治沙防线的第四代人。

“2021年5月初,我从工作地沈阳回老家章古台探亲,刚一下高速口,就看到了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刘莹说,出于好奇,她在学校门口停留许久,晚上回家跟父亲分享了白天的见闻。

当晚,平日话语很少的刘树新和女儿谈了很多,很久。“起初,我只知道我爷爷、大爺和爸爸是护林员,关于太爷爷植树造林的功绩,我那天才第一次听说。”刘莹说。

回到沈阳后,刘莹时常想起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想起父亲讲过的家族治沙故事。适逢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招聘讲师,几乎没有犹豫,刘莹辞去了在沈阳的工作,回乡应聘并成功入选。

刘斌墓是刘莹讲解次数最多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太爷爷作为第一代治沙人,向沙漠发起挑战的地方。”

“起初到现场教学点备课时,顶着日出走、迎着日落归;夏天30多度的天气,头上太阳晒、脚下沙子烤。可和治沙英雄相比,我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刘莹说。

仅仅一年有余,刘莹曾经白皙的肌肤已被烙印上和祖辈父辈相同的古铜色——这是家族的传承,也是治沙人的勋章。

与祖辈父辈从事防沙治沙具体工作略有不同,刘莹工作的重点是传承、宣讲矢志不渝、永不退缩的彰武治沙精神。

“历经70多年的艰苦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彰武治沙,已经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更加系统的治理新模式。”刘莹说,“身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要成为彰武治沙精神的实践者、传播者,不负先辈,为家乡的生态建设做出更多努力、更大贡献。”

在彰武,人和树,都坚韧。像刘家四代一样爱林护林的人们更是不在少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侯贵、“马背上的绿色守护神”护林员李东魁、辽宁省沙地所的一批批科研人员……他们将沉甸甸的汗珠子砸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造就和续写着“大漠风流”。他们有着不同的姓氏,却共享着同一个名字——治沙人。